

• 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丛书 •

道书存见音乐资料研究

蒲亨强 著



蜀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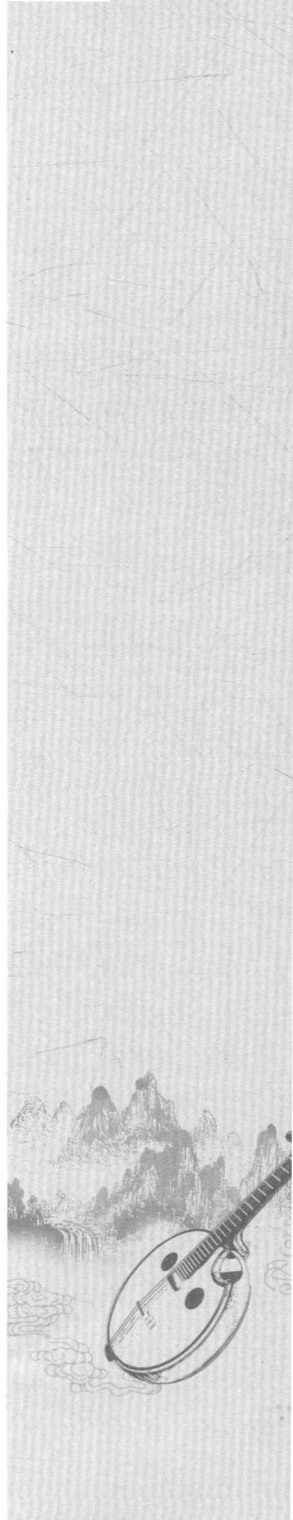
• 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丛书 •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项目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道书存见音乐资料研究

蒲亨强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书存见音乐资料研究/蒲亨强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6. 7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卿希泰主编)

ISBN 978-7-5531-0692-2

I. ①道… II. ①蒲… III. ①道教—宗教音乐研究—中国
IV. ①J6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8840号

道书存见音乐资料研究

蒲亨强 著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8.125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692-2
定 价	4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 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总序

卿希泰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在这个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国家“985工程”开始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名校率先获得国家较大力度的支持；紧接着，教育部又与有关部委、省市签订协议，对部分基础好、水平高的高等学校进行共建，予以重点支持。这个“工程”的实施，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迎接知识经济挑战而采取的重大决策，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大举措。经过几年的建设，“985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大大提高了社会服务工作水平，而且缩小了我国高等学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当然，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它需要

较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需要长期形成的优良学风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且需要有强大的经费投入作为支持。有鉴于此,国家于2004年6月又开始启动了“985工程”二期的建设工作。“985工程”二期的建设,是国家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创新思路寻求高校持续性、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举措,其基本思路是:集中资源,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发挥优势,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促进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使之成为攀登世界科技高峰、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带动相应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基地,使高等学校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同时,引进和造就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加快建设一支具有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和技术支撑队伍。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决定集中经费对一些高校的名牌学科进行重点扶持,使之成为汇聚人才、持续创新的“平台”或“基地”,以加快这些学科的成长步伐。

在“985工程”的建设工作中,国家尤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早在2003年教育部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2004年中共中央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与此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2004年6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在“985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当前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机遇,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思想库”“人才库”的作用。同时,周济同志还指出:我们应当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

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孕育和催生新的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形成一批能够解决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基地。“985工程”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设立的，其特点在于跨学科并具有开放性，能够围绕国家、区域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组织主攻方向并进行联合攻关。

在“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建设中，国家提出了建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经过评审，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有幸成为承担“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建设任务的主干机构。在此基础上，还整合了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和藏学研究所两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专门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与宗教学有关的科研力量，并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研究人员来参加建设，共同开展研究工作，以达到集合海内外本专业的学术精英和优势科研资源，突破个人分散研究的有限视野，将个人的学术专长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研究集体，故这个基地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平台。

在建设“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时，我们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这一国情出发，结合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的要求，初步确定有宗教学理论比较研究、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西方宗教与当代世界研究、宗教信仰与民俗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等五个方向；考虑到基地的学术力量和国家需要等实际情况，拟定以四大课题为主要研究内容：一是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二是中国道教思想发展与道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三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四是中外宗教

的对话与交流研究。其中，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这个课题，主要是对中国各种宗教及其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宗教现象，来对有关宗教学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而且在于通过系统考察中国各种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来为我们国家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中国道教思想发展与道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这个课题，主要着眼于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迁，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在当今中国社会里的作用，挖掘其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这个课题，主要研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宗教的历史和现状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重点在于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各种宗教进行调查研究，希望这项工作能为祖国大家庭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服务，并为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西部大开发服务。中外宗教的对话与交流研究这个课题，目前主要是对国内外宗教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优秀学术成果进行翻译，以图加强中外的学术交流并为我国宗教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与此同时，逐步开展西方宗教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和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等方面的研究，以适应人类文化全球多元性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到2009年“985工程”二期建设结束的时候，“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以良好的成效顺利通过验收，并在教育部、财政部的指导下转入“985工程”三期的建设工作。为了在二期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同时也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基地在三期更名为“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并设定了七个研究方向，分别是：宗教学理论与当代宗教问题、道教学与道教史、中国宗教与中国哲学、世界宗教与外国哲学、宗教与美学、道教与古代科学技术、

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社会。

我们一直希望依靠创新基地的集体力量，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能够取得一些重大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也希望在创造这些成果的过程中能够锻炼出一支优秀的学术创新团队。

当然，除了二期、三期的各个研究方向以外，我们并不排斥创新基地的成员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又决定出版一套以基地名称命名的学术丛书。这套“丛书”，不仅将囊括以上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可包括其他有关宗教、哲学研究的优秀学术著作；不仅出版基地成员有关宗教、哲学研究的优秀学术著作，而且非常欢迎基地以外的海内外学者向本“丛书”编委会申请，经过编委会评审通过之后，即可将其宗教、哲学研究的优秀学术著作列入本丛书出版。这样，或可在建设期内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更大力度地促进我国宗教学、哲学学科的发展。

总之，“985工程”的建设时间虽然是有限的，但我们的学术探索却是无止境的。我们希望，“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能够为今后的科研机构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学术研究能够为宗教学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而其所培养的创新团队中也有一些人能够成为学术界未来的领军人物。同时，也希望这个“基地”能架起一座沟通国际的桥梁，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5年11月12日书于四川大学芙蓉楼

2013年7月10日改于四川大学农林村

（作者卿希泰，现任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

前言：道书——一个亟待开发的音乐资料宝库

在中国音乐学与道教学研究领域中,道教音乐都算是起步最晚的一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突破研究禁区算起,迄今仅有三十余载。虽然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赞赏,但客观地说,总体研究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问题还较严重。

问题之一,研究对象界定不精确,妨碍了对道教音乐面貌和本质的认识。道教音乐是为宗教神学信仰服务的音乐现象,其面貌丰富复杂,具有多层性。研究的当务之急应先确定研究对象的主体,以逼近其区别于一般世俗音乐的本质。而当前的道教音乐研究,多未充分注意道乐的分层特点,将不同道派的、仪式的与非仪式的、道内的与道外的音乐现象视为一物而进行研究,日益有将研究对象模糊化与泛化的趋势,导致道教音乐内核与外缘混淆,纯正的道乐传统特征难以显现。例如对同一地方道乐特征的研究,不同学者往往得出不同结论,一说具有地方民间音乐风格,一说具有古代宫廷音乐风格。结论的矛盾如此之大,而又各有依据,振振有词。问题就出在,他们研究的对象虽在同一地区,却是不同道派,一为住观道,一为火居道,两道派的音乐本有极大差异,现不作区分,各说各话,当然会引出不同结

论。作者自以为是，读者却昏昏然不明就里。

问题之二，历史研究极为薄弱。尚无对资料与对象统一贯穿的通史研究，重大历史阶段的划分、重要人物的评价或付阙如，或众说纷纭，甚或有谬误的认识，至今不清楚现存道教仪式及音乐曲目的历史来源。

这里略举两例以明问题之严重性。关于道教仪式音乐形成时期及其代表人物，学术界多认定北朝时期的寇谦之具有开创、规范道乐之首功。当代道教音乐大师闵智亭认为：“到了北魏寇谦之，创出《云中音诵》，始改‘直诵’为‘音诵’，即有了较规范的‘声乐’和使用‘器乐’伴奏。”“远在北魏神瑞二年（415）嵩山道士寇谦之撰《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是道教音乐现今能见到的最早记载。”^① 道教史学界及音乐学界也多持同一看法，将创建道乐之功归为寇氏。然而，这种认识不符合道教发展史的真实情况，无论从音乐改革的成果或从历史影响来看，寇氏之贡献前不及东晋时期的“灵宝斋”，后不逮南朝时期的陆修静。另一事例是关于皇室御制道乐的研究，在唐代、北宋及明朝都有皇室亲自参与道乐制作发行之举。在道教学界及音乐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大都将其视为传统道乐的等同物，甚至视为道乐的发展高潮的标志。其实如果细查其内容实质就不难发现，这些东西要么是传统道乐的填词之作，要么是含有道教意念的附庸风雅之作，要么是借用民间或雅乐旋律的改窜之作，从音乐上看多与传统道乐相去甚远，更谈不上是道乐的主流或高潮。这些错误认识的产生，固有多种原因可寻，但缺乏系统细致的道教文献资料研究则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因。

^① 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室编：《全真正韵谱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问题之三，道教音乐的基本观念概念不清。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诠释时有所见。例如道教最常用的基本概念“玉音法事”，即使道教研究大家陈国符教授也曾误解为：“玉音谓御制，法事谓斋醮仪^①，《玉音法事》谓斋醮仪中吟北宋帝御制道词。”^②此解非是。

在道教传统概念体系中，“玉音”从来都专指仙乐歌曲。在《玉音法事》卷下所载道歌中，凡“玉章”和“玉音”等词，均与吟唱经韵相应。南朝陆修静所制道曲《步虚第八》中就有“众真诵洞玄，太上唱清谣。香花随风散，玉音成紫霄”等句，将“玉音”与“清谣”相举，象征仙乐十分明白。大约在唐代记载成书的《玉笈济幽判斛仪》“祭炼”吟诵文之后有七绝诗一首唱云：“玉音仙乐响琅玕，鹤舞鸾飞度九关。执篆把符超法界，参朝金阙覲天颜。”^③更确凿地指明了玉音即仙乐。后世科仪文献中，此词语义大抵不离此轨，如明清科仪文献中常用“玉音梵唱”之句。可见，以“玉音”泛指“道乐仙音”，素为道教的基本常识观念。“玉音”与道典道歌中常见的“玉章”、“清谣”、“空歌”、“梵响”、“灵章”等概念一样，都泛称仙乐。至于“法事”，在道教文献与观念中，也均与音乐行为对应，意为具有法力的事项。如《玉音法事》卷下中的“法事”名目下，均对应以音乐曲目。直到明代仍保留这一含义。如明宣德七年周思得撰《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④，通为四十卷，分为十九“门”上百“品”，开卷即在《赞唱应用门》专设唯一的《法事品》，收载历代

① 斋醮：古时斋醮初各有其义，斋为正式仪式，醮则是斋之后表示酬神的附加部分，标志仪式的结束。

② 陈国符：《北宋玉音法事吟（线）谱考稿》，载《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民族音乐学会1989年编，第181页。

③ 《道藏》第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0—181页。

④ 胡道静、陈耀庭等：《藏外道书》第16册，巴蜀书社1995年，第32页。

道乐曲词达二百多首。此书卷二四《明法事赞咏》更明确解释“法事”之义，专述道乐的起源及类名为法事的由来。大意谓道乐是天尊所授，复命上帝按笔以施而形成，是乐有修真长生悦神之功用，其意义深玄，由前古经典秘传，如此等等。可见，“法事”作为“玉音”的等价概念，强调仙乐是具有法力的事项而已。这样理解，既理义皆通，亦符合道教的传统观念。玉音即法事即具有神奇法力的仙乐。陈教授是专攻道教史的大家，也曾写过最早的道乐源流史专著，尚不免望文生义之误，原因就在于他尚未对道教音乐原始资料作全盘的考察研究。至于音乐学者的理解，就更为隔靴搔痒了。

以上问题的存在显然并非无关痛痒，而事关学术研究的基本要素。试想，如果我们研究对象不明、研究材料不足、基本概念误解，怎么可能认识对象的本质特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核心原因：未能从局内人的立场思考研究对象，未能以局内人的一手资料为基础来研究问题。显然，这两个问题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代表观念，后者代表材料。

因此，当前道教音乐学术研究要有大的突破，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既然我们是研究道教音乐，就要以尊重和同情的态度去正视她，了解清楚道教自己是如何看待和运用音乐的。若以自己的观念或经验来对待道教音乐，很可能研究的已不是真正的道教音乐了。观念解决了，材料就好办了。道教存有卷帙浩繁的经典文献，记录了大量有关音乐的资料，这些资料正是我们研究道教音乐的主要凭借，是一个值得深入开发的资料宝库。

说来奇怪，在道教学研究领域中，细研道教典籍是一个最基本的环节，但在道教音乐研究界，至今还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和积极实践。一些学者们，在还没有对道藏等重要道书中的音乐资料进行挖掘整理的情况下，就匆忙地写出道教音乐史略一类的历史研究论著，虽然勇

气可嘉，但其能够写出什么水平的论著，则是不难想见的。

我在十多年前已意识到道教典籍中的音乐资料是研究道教音乐的可靠资料。在上世纪末的博士论文撰写中，我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先在图书馆枯坐数月，从道典中查找到大量新资料，据此有效解决了以往道乐史研究中资料极度匮乏的问题，首次理清了道乐史的发展脉络和某些规律。初战告捷，信心更加坚定。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全面搜寻和研究音乐资料，较好解决当前道教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此就成了一个更加明晰的研究目标。按照这个目标我设计了研究计划并获得了国家社科项目资助，使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本书即是此项研究的初步成果。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道教典籍确实是值得开发利用的音乐资料宝库。所谓“道典”，主要指《道藏》、《藏外道书》、《道藏辑要》等经典文献。据目前所知，道典文献中所录音乐资料大致分四种类型。一是仪式文献，即道教所称的“科仪”、“科范”、“科书”、“科”、“仪”、“斋”、“醮”等，实质上，它们都是实录各种仪式过程的文本。典型实例如《授度仪》、《灵宝斋》、《黄箓大斋立成仪》、《领宝领教济度金书》等。仪式文献的初具规模和正式见诸文献，始于东晋时期的“灵宝斋”。南朝刘宋时期陆修静更明确建立了完整的仪式体系和“照本宣科”的实践传统，使仪式实践更加规范化。以后历代道教大师，都作了整理改编科书的大量工作。由此仪式文献承前启后，传承千余年而延续不绝。又因道教仪式必伴随音乐，仪式文献都有丰富的音乐资料记载。故也可视之为仪式音乐文献或与音乐直接相关的文献。仪式文献是道教音乐资料的大宗。因其记录的详细、延续的久而可供我们研究道教音乐的很多重要问题。诸如道教音乐史的脉络、音乐的运用方式和功能、道教音乐观念和概念的本义等。第二种类型是道教音乐词曲文献。即直接记录音乐曲目、乐谱

和唱词的文献，也是我们研究道教音乐的一手资料，典型实例如《玉音法事》、《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中的《法事品》等。第三种类型是有关音乐教育培训的专门文献，这种文献存量不多，但价值珍贵。如南宋成书的《道门通教必用集》，详细介绍了从道童成长为法师所需要掌握的音乐曲目和演唱技能等；第四种类型是散见于各种经书的有关音乐概念、观念的描述。道教一般重实践而轻理论，很少专门谈论音乐问题，但在各种经书中，往往穿插了对音乐事项的认识和看法，这些看法最能代表道教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若细心理董，集腋成裘，也当有可观的收获。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按编年体例对典型道教音乐文献作历时性编排，全书分为“渊源”、“萌芽”、“形成”、“发展”和“定型”等几个历史阶段，每阶段的音乐资料以典型文献为纲进行摘译研究，以期从文献学角度追踪道教音乐历史发展的线索。同时按“仪式音乐”、“音乐思想”、“典型人物”等论域作横向分类，以研究不同时期道乐的全貌及特点。

具体撰写体例按道乐发展历史阶段分章，每章先概述该阶段道乐发展的大势及音乐文献的基本情况。再摘译并分析其中的音乐资料，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较翔实的一手资料。同时对资料涉及的音乐现象展开研究，尤其对于以往道教音乐研究中模糊的、有争议的和错误的结论展开辨析，提出新的认识和结论。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文献，但也注重和提倡“古今互证”的研究方法。历史资料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道乐的本质特点和历史脉络，更好地理解现存道乐的渊源和价值。但现存道乐的研究成果，同样也可弥补文献所载之不足，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文献记录的音乐概念和现象。简言之，即将活的音乐现象与死的文献资料相结合相印证而解决某些疑难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古代乐谱记录匮乏的条件下，“古

今互证”更是十分必要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包含“以今证古”与“鉴古明今”两个侧面，不妨举例说明之。

以今证古，即参照活的音乐实践来解读古代文献，可解除古代文献记录中音乐意识淡漠的局限，更准确地认识文献所隐含的音乐信息，从而为构拟古代音乐的原貌提供可能。在研读古代文献时，判断文本的音乐属性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一般来说，判断清代以前仪式文献中的音乐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文献标识。一为乐谱，二为曲名，三为唱、吟、咏等提示，四为文本的格律。综合以上标识，判断其为音乐文本没有什么问题。但也有相当多的文本，并无以上四种提示，且采用散文或骈文格式。若仅从文本来分析，很难确认其真实的音乐属性，容易误解为念吟或说白。如当代全真道施食仪式音乐中普遍运用的《叹文》一曲，在古代文献中均未见此曲目，仅载词文。如清代《施食》中第六首《叹文》的词文^①：

伏以三途罢拷，六道临坛。或生于万国九州之地，居于五岳四渎之中。春秋之世，判乱真主草主。战国之时，并吞南朝北朝。晋宋齐梁，棺椁尽埋于旷野。周秦吴魏，尸骸俱葬于荒郊。春去秋回，四时不逢于祭祀。寒来暑往，八节罕遇于追修。凄凄惨惨，使用钱财，哪有讴讴歌歌，吃穿衣食并无。冻的皮破肉绽，饿的形瘦骨枯。老的少的，悲悲切切。大的小的，哭哭啼啼。瘸的跛的，扶墙摩壁。聋的哑的，摆手摇头。瘫的瞎的，拉扯拽拽。强的弱的，闹闹诹诹。冷冷清清，饥寒难忍。泪泪汪汪，苦楚伤情。可怜可怜，哀哉哀哉。既到吾坛，必听吾示。不许混乱争抢，休要逞势撒泼。莫使粗心大胆，勿得弄狗惊鸡。早向今宵求解脱，勿学往日用痴迷。且喜当坛之盛会，丢却背后之

^① 胡道静、陈耀庭等：《藏外道书》第14册，巴蜀书社1994年，第617-618页。

是非。最忌蛇心鼠眼，犹嫌虎咽狼餐。饱则从君请便，饥则任意所餐。都来拱手听加持，面礼真师求解脱。尚虑汝等，诸仙子众。自倾阳世，久处阴司。神魂荡散，精魄飞扬。咽喉闭塞，饮食难通。仰劳道力，宣扬秘咒。

该文篇幅长大，文体奇特，将骈偶体、对偶句、四言诗、六言诗错杂而用，按音乐学家的理解颇难配合曲调，多理解为是念说，但实则不然。在当代道教音乐实践中，它实际上是一首抒咏性极强且旋律丰美的歌曲。全曲为对比性的三段体，前有悲切叹息的散板引腔，第一段是个一气呵成的连绵起伏的长乐句，全用衬词，情调低回委婉，曲调优美流畅；第二段为两个长乐句，旋律起伏大，情绪激动，两句后面均有器乐过门，增加了音乐对比性；第三段则运用朗诵调，字密腔紧，情绪更趋激动。全曲音乐深沉幽美，情绪丰富，各种不同情绪的曲调交织循环，组成一首动人的命运咏叹调，堪称道乐精品。此曲在仪式中多次运用，每次的旋律形态大同小异，极富道教意蕴。这样一首韵腔，如果不结合当代道乐的充分研究，仅从文献角度考虑，是难识其真相的。

其二，鉴古明今。即从古代文献的整体的细致分析中，可以准确理解当今仪式音乐的宗教背景和含义。如当代《举天尊》一曲，通常在道教仪式中反复运用。每次运用的位置，大多前接一首抒咏唱腔，后接说白。由于其结构短小，抒咏性也不强，又一律煞于宫音构成稳定终止感。因此从音乐逻辑上看，很容易理解为是紧接前面韵腔的一个补充终止。而且难以理解，为何这样一个曲目会在仪式中反复频繁地出现。现根据古代文献的整体分析，才恍然大悟其含义。原来这首简单的旋律，在仪式中有重大意义。道士要完成一场仪式的功德，须请各司其职的多位天尊助力，道士们邀请天尊时，都用歌唱法呼唤不同天尊的名号。因而，每唱一次《举天尊》，就预示着仪式场

景和程序的转换。每次请天尊的名号不同，但旋律雷同。而这首旋律的稳定终止感，正可协助构成场景的停顿和转换。如果不整体研讨历史文献，就很难明白此歌音乐形态和运用方式的产生原因和宗教含义。

通过以上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本书意欲达到两个研究目标。其一，推动道乐研究的资料建设，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可靠翔实的原始资料库，并建立从典籍所载音乐材料入手研究道教音乐艺术的观念和方法论；其二，根据道典所载原始资料研究道乐史论的一些基础理论和疑难问题，诸如，明确道教音乐的内核与外缘，理清道教仪式音乐发展的全程线索、阶段性特征和代表人物，理解道教的音乐观念与概念体系，认清道乐的古今联系，由此更加逼近道教音乐作为宗教音乐品种的本质和真相。

从研究的最终结果来看，这一目标初步达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道教音乐是一个相当复杂丰富的音乐现象，文献中有关记载既浩如烟海而又不乏隐晦深奥之笔法，还需要作更多更深入的挖掘和整理研究。本书研究只是开一个头，希望能由此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关注，进入道教典籍这一音乐资料的宝库中，探索出更多的奇珍异宝。